

見黃東」雖然省略了「我」這個主語，但作者毫不諱言自己希望借「遇見」一詞表達自己「這個史學學徒與你（黃東）這個歷史人物」之間的扣接。筆者以為，此書與其說是一位歷史學者對黃東等小人物研究的成果，還不如說是學者與歷史人物跨越時空相遇和交往而產生的結晶。

除了史學方法論層面的實驗性，該書關於語言的跨文化傳播機制的研究發現對於現代傳播學頗有啟發。在黃東所生活的時代語境中，普通民眾識字率低下，印刷技術尚未普及，正規英語教育尚未成形，卻發展出口傳心授、「雙向對話」翻譯這樣極具創意的跨文化語言交流方式。這提醒我們注意，無論在怎樣的媒體技術環境下，語言是文化交流和傳播的重要底層基礎。今天，傳播技術的迅速發展帶來層出不窮的新鮮傳播現象，這為研究者帶來豐富的研究對象，也對研究者如何在理解新事物的同時不忘回應人類傳播史的基礎問題提出更大的挑戰。網絡媒體用戶在使用中根據特定需要，發展出綜合文字、圖形、聲音媒介等前所未有豐富的語言形式。這些新鮮的語言形式是否衝擊了我們對「語言」的傳統定義？這些多媒介語言帶來什麼新的跨文化交流可能？通訊的便捷和新語言學習工具、互譯系統的出現，是否真的能夠消解語言的文化鴻溝？若歷史深處的黃東們目睹幾百年後的現代人手電話中彈出的表情包，不知他們是否會提出上述這些問題呢？

大概作者並不想把作品的讀者群體局限於學者同行，因而在行文中幾乎不用學術行話，概念化的意願甚為克制。儘管書的結構和內容已經甚為豐滿，筆者出於社會科學訓練的習慣，讀畢有意猶未盡之感，為那些本可以進一步而未進的概念化空間感到有點可惜。為了緩解這種心情，筆者忍不住寫下這篇書評。

嚴麗君

廣東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著，郭偉全譯，《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1640-2000)》，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年，310頁。

1901年正月初二，山西士人劉大鵬在日記中寫道「吾邑洞兒溝，為晉陽一川教民屯聚之巢穴」。(劉大鵬著，喬志強標注，《退想齋日記》，北

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頁86）洞兒溝這個位於山西中部的小村莊，是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繼研究鄉居者劉大鵬的一生之後下一個關注的主題。作者運用多種語言的檔案材料、結合近十年的田野調查與口述訪談，為讀者展現一個華北村莊三個世紀的跌宕歷史。

《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以下簡稱《傳教士的詛咒》）一書分為七章，描述洞兒溝村在18-20世紀與基督教發生的聯繫與互動。本書的第一、二章可以視為一個敘述單元，主要講述的是鴉片戰爭之前的洞兒溝故事。在洞兒溝人對於祖先與村莊歷史起源的記憶中，天主教就是最初的村莊創建者在家族中世代相傳的一個宗教。由於缺乏傳教士的指導，在洞兒溝早期皈依者的宗教活動和崇拜習慣中，可以看到非常強的儒學與佛教禮儀色彩。事實上，當時很多人並未將天主教視為一種「外來」宗教，而更多時候將其認作白蓮教、佛教的某些派別。直到18世紀下半葉，洞兒溝才迎來了第一批常駐的傳教士，隨着他們的到來，天主教的核心聖禮告誡和彌撒才在當地逐漸得以推廣開來。隨着清政府禁教政策的日益嚴苛，歐洲的傳教士到達山西愈發不易；歐洲資助的短缺也使得他們不得不探索訓練中籍傳教士。在18世紀的山西，晉商對傳教事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商人不僅保障傳教士的安全，也在財富上給予了傳教士大力支持；晉商建立起的聯通中部與西北的行商網路也為基督教在這一時期的對外聯繫提供了便捷。在第二章「主教與狼」中，作者講述幾位神職人員的傳奇故事。在路類思(Luigi Landi)、金雅敬(Giovacchino Salvetti)、王雅格等教士的故事裡，可以看到當時的中西教士親密地展開合作，天主教也並未表現與「中國文化」多麼地不適應，天主教似乎已經融入了中國社會，成為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鴉片戰爭開啟了帝國主義在華擴張的序幕，也深刻改變了天主教在中國的發展方式。不平等條約賦予的法律地位令傳教士無需像從前那樣擔憂來自官方政府的干擾與迫害，來自歐洲的資金使得他們得以擺脫對當地商人教眾群體的物質依賴。本書第三章介紹一位跑去羅馬「告狀」的中國教士——王廷榮，他在那不勒斯的中國學院深造時見證了義大利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也親歷了1848年激烈的歐洲革命。王廷榮回到洞兒溝後，新任主教杜約理正在借教士地位的上升施行更為嚴格的規定。王廷榮與杜約理不同的生命經歷導致他們對教會內涵的理解分歧很大，二者爆發了激烈的爭執。隨着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新條約的簽訂，中籍教士與義大利教士之間地位的不平等逐漸加大，二者的矛盾也尖銳起來。王廷榮的羅馬之行，正是中籍教士不滿於新的權力關係、爭取自主權的生動體現。在新的發展方式下，傳教士的行為愈發

張揚，天主教群體也越來越難以融入周邊人群，官方也開始試圖借助地方寺廟教團抗衡天主教勢力。這些因素的累積最終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中引發了對晉中地區天主教村莊的暴力攻擊與血腥殺戮。這場浩劫進一步加深天主教群體與周圍群體的隔閡，天主教徒真正被孤立起來，成為一個強大和排外的群體。義和團運動的另一直接後果，便是數額巨大的庚子賠款。賠款使得晉中地區的傳教士財富劇增，也賦予他們更大的權力，加劇教士與民眾之間的緊張關係。第五章聚焦於庚子賠款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段歷史時期，描述在革命、侵略、民族主義思潮激蕩下，掌權的傳教士與當地民眾之間的緊張關係。

第六、七章講述的是1949年共產主義政權建立後洞兒溝天主教群體的歷史變遷。長期以來，山西的天主教群體對共產主義懷有強烈的敵意。建國後到1965年之間，山西天主教教階體系和各個機構逐漸被消滅殆盡，普通信眾開始被迫直接面對來自國家權力的壓力。國家的工作組與信眾對天主教群體歷史的理解差異巨大：前者將天主教視為帝國主義侵略帶來的外來宗教，後者則從自己瞭解的過去出發，將這場運動看作拳亂之後的又一輪迫害，甚至預示了世界末日的來臨。社教運動與文革的高壓與迫害最終瓦解洞兒溝的教眾群體，使得它內部出現了巨大的分化與裂痕。作者認為，這一時期的迫害反而強化天主教徒作為一個整體的身份認同，為80年代後的宗教狂熱與大規模皈依奠定基礎。借着改革開放的機遇，洞兒溝的天主教群體與外部世界的聯繫也變得更加緊密，再次體現出加強與國際教會聯繫的特點。

沈艾娣教授無疑是歷史學者中「講故事」的高手，《傳教士的詛咒》一書每章都由一個或數個故事展開，「讀故事」的興味自非書評所能傳達。通過呈現洞兒溝這個山西天主教農村三百年間的精彩故事，作者希望提供一種重新看待基督教在華傳播歷程的視角。受晚清官員與傳教士對中國基督教史理解的影響，既往的中國天主教史研究往往預設「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在本質上的不同，以此出發來探討天主教在華「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的進程，思考傳教事業失敗的原因。但在《傳教士的詛咒》這本書中，作者嘗試將敘事的尺度縮小到洞兒溝村，這個天主教村莊裡的教徒自己「講出來」的歷史提示我們，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中的基礎發問方式可能需要做出調整——從「基督教是否已經成為中國宗教？」，轉變為「中國人是怎麼樣與作為世界宗教的基督教產生聯繫的？」(頁9)

《傳教士的詛咒》是一部關於聯繫的歷史。在作者看來，所謂「中華文化」與「基督教崇拜」從來都不是僵化的、累世不變的，而應當是多元的、

總在變動之中的，所以不能將二者進行本質主義的理解。洞兒溝三個世紀的歷史，充分體現基督教與中國地方社會在變動中產生的諸般聯繫。這裡面既有為了爭取權益跑到羅馬告狀的中國教士王廷榮；也有攜庚款之威而來，與村民產生激烈矛盾後憤怒而對洞兒溝村下咒的義大利傳教士法濟尼(Francesco Fazzini)。既有村民口中沒有被逮捕，騎着自行車逃跑的李珍香；也有在文革後積極傳教的「老段」段潤成。作者用一個個鮮活真切的故事與人物展現洞兒溝村的教士與信眾與國際天主教會發生的聯繫，用長時段的微觀考察挑戰基督教在華傳播史的基本視角。本書旗幟鮮明地認為：在18世紀的山西地方社會，基督教與中國宗教文化本來有很多重合與相似之處，在鴉片戰爭之前，基督教已經成為了當地社會的一部分。此地區的天主教習俗和本土民間宗教之間的差距，正是在後來幾個世紀間慢慢擴大的。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是，本已本土化程度很高的天主教逐漸加強了與國際教會的聯繫，成為國際天主教體制與網絡中的一部分。中國的基督教史，是基督徒在幾個世紀間慢慢引導中國教會走向國際教會的過程（當然這並不意味着這個過程會表現得「一帆風順」）。

在聯繫中突出反映的，是不同主體幾個世紀以來經歷的劇烈權力關係變化。權力關係的變化，也是天主教與中國本土民間宗教（或者說「中國文化」）之間差距逐漸拉大的重要原因。在洞兒溝三百年間的曲折歷史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國際天主教、中國政府、地方商人，以及中籍與來華傳教士、普通教民之間的權力關係變化，這些變化無不受到國際、國內（不論是整體的還是地方的）形勢的深刻影響。英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勝利拉開了帝國主義在華擴張的序幕，這將深刻改變地方社會中不同主體的權力關係，也成為天主教與地方宗教逐漸拉開距離的起點。不平等條約賦予的地位與歐洲的資金極大提升來華傳教士的地位，他們在新形勢下的作為不僅激化中外傳教士之間的矛盾，而且使得天主教群體越來越排外。這種排外性引發地方政府與其他宗教團體的不滿，最終在義和團運動中爆發對基督教眾的大規模暴力。作為義和團運動後果之一的庚子賠款進一步加強傳教士的威勢，也造成他們與教眾之間的緊張關係。1949年共產主義政權建立後，強勢的國家以更強勢的姿態再次出場，一系列政治運動將原有的教會與教階體系幾乎徹底摧毀，強大的國家力量甚至使教民群體也發生分裂。山西的天主教雖然在80年代以來取得了極大的發展，但仍然需要謹慎地拿捏「走向國際教會」的分寸與限度。

除了在內容上提供了重新認識中國基督教史的新視角，《傳教士的詛

咒》一書的貢獻還在於為微觀史與全球史相結合的史學方法提供了寫作範例。誠如作者自述，本書的寫作是出於對山西與洞兒溝故事的興趣，試圖為這個天主教村莊做一部微觀史。（沈艾娣，「講座：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澎湃新聞》），但由於關照的主題與運用的材料，最終呈現在讀者面前的卻是一部「顯微鏡」中的全球史。全球史的興起原因之一就是對「文明衝突」，或者是對文化持本質主義理解的一種反動。沈艾娣教授的這本書主要挑戰的也是以往基督教史研究中，將外來基督教與地方文化對立的預設，試圖用「走向全球」的視角帶我們重新思考基督教的在華史，通過微觀的考察，講了一個「天下教友是一家」的故事。如譯者郭偉全所言：「不管《傳教士的詛咒》的敘事框架是否成立，至少沈艾娣的論證是相當有力的。」（郭偉全，〈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讀書》，2020年第4期。）進而言之，好的微觀史研究或許最能挑戰一些既有的「成見」，讓讀者在「顯微鏡」中，重新思考認識「整體」的方式。

杜澤宇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Corporate Conquests: *Business, The State, and the Origins of Ethnic Inequality in Southwest China*, by C. PATTERSON GIERSCH.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304pp.

紀若誠(C. Patterson Giersch)的新書 *Corporate Conquests: Business, The State, and the Origins of Ethnic Inequality in Southwest China*（《商貿組織的征服：商業，國家和中國西南民族不平等起源》）聚焦於雲南商貿組織在19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間的發展和變化，探討邊疆地區的商貿發展與國家建設之間的歷史互動過程。雲南商人是這一互動中不可或缺的能動者，他們學習山西科學的記賬體系技術，發展合資經營的管理模式，建立跨區域的貿易網絡，不斷擴展貿易規模創收利潤。與此同時，他們在地方建造新式私人住宅和諸如學校、圖書館等公共機構，在進行自我展示的同時積極推動着地方變革，將新的技術和概念引入地方社會，積極構築着雲南視角下的現代性圖景。從這一角度來看，紀若誠認為雲南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並非如所宣傳和描述的那樣是「孤立的」、「落後的」，相反，正是雲南商人搭建的遠距